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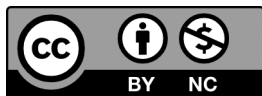
## 1958：银幕“拔白旗”

朱安平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958 年，处于“大跃进”狂热之中的电影界，又被“拔白旗”巨浪席卷。刚刚步入成熟发展的电影事业，在蒙受重大浪费和损失的同时，遭遇严重干扰和挫伤，留下曲折前行的印迹。

### 一、肇始：高层诘难

酿成银幕“拔白旗”运动，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康生，可谓始作俑者。1958 年 3 月，在东北养病的康生调看了一批影片，据其所看“印象”，“有好的，有可以的，有的有些意见，有的使人越看越生气，看了生气的片子不是使人休息，而是心情沉重”，认为“第三类片子”，“可以映，但是作为思想教育的工具，就很值得研究”。他感到更为“值得研究的”，是在长影“看过片子之后，我们说是最坏的他们认为是最好的。我们说是最低级的他们说是最高级的，问题到底在哪里？”由此批评“长影厂看来无文化，既没有无产阶级文化，也没有资产阶级文化。”<sup>[1]</sup>

消息传到北京，电影界人士感到不安。一向关注电影的周恩来很为重视，当年 4 月文化部电影局召开故事片厂长会议期间，特意调看了几部最新完成的影片，召集电影局负责艺术生产的副局长陈荒

煤等谈话。

“已准备挨一顿狠狠批评”的陈荒煤，意外看到“周总理显然已经做了充分的考虑，他并不是以指责的口吻来批评我们，为什么拍出一些风格低级的作品，追究领导的责任，或者认为创作人员有意识要来‘改造党’和‘反党’”，只是开始简单讲了一下，看了《寻爱记》《幸福》《凤凰之歌》《上海姑娘》等几部片子，“感到很别扭”，认为“有的是原则问题，有的是风格、情调低级，不能反映时代，没有伟大理想的召唤。基本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作者没有实践”，然后立即提出，“如果目前不能生产好的故事片，是否可以多拍些纪录片。纪录片倒可以反映生气勃勃的时代面貌，可以满足观众，也可以教育创作人员。”

陈荒煤回顾说：“这次谈话的中心议题，我记

[1]《康生同志在制片厂厂长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印：《长春电影制片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材料汇编》1968 年 3 月，第 126、128 页；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38 页。

得比较清楚。总理主要是强调电影创作者的实践问题，”他一方面指出某些影片的缺点，但同时也指出《上海姑娘》《乘风破浪》中的“女演员演得很像”，这说明青年人反应快、学得快，如果把他们放到生活中去锻炼，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演好，所以问题还在编导。

就在这次谈话结束之际，周恩来指示正在召开的故事片厂长会议，“要多谈几天，找康生同志谈谈，你们不要当作什么指示，随便谈谈，作为启发。多谈谈虚，各方面都可以谈谈。中心问题是如何把电影的风格提高一步，像主席说的阶级的民族的风格，思想提高，艺术完整。事实上经过几次反复要有所提高。”他还提及，“我们不怕毒草，但主流应该是好的。康生同志说《球场风波》是毒草，你们再研究一下，当然毒草也可以放（映），我们倒不怕毒草见诸群众，群众可甄别，主要的是要给群众指明方向。”<sup>[1]</sup>

4月21日，康生被请到会上作报告。他劈头就以严厉而刻薄的口吻，挖苦和嘲笑新看到的《青春的脚步》，“那个片子给人的印象是好像使世界倒退了几十年，当时感到很奇怪。建国八年了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怎么还有这些片子呢？不禁使人想起张织云、王汉伦等人来，对这些人老早革命革忘了，这次看了《青春的脚步》又把她们想起来，甚至想到这个片子，是不是比她们演的好些呢？”继而讲起在长春看的片子，以《三里湾》（即《花好月圆》）、《牧人之子》两部属于“中间的片子”作例子，斥问“为什么一个人物、一个故事，一到编导手里人物就变了”“把穷苦孩子改造成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了”“改变的重点是往知识分子方面改变”。《地下尖兵》“这个片子的问题比较明显”。《球场风波》“我看这个片子里有罗隆基的思想，比吕班的《未完成的喜剧》高明的多了，吕班的《未完成的喜剧》，只是天然辛石，吃了不过泻肚子，毒不死人，而《球场风波》则是‘化学’药品。……这个片子可以说是渗透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倾思想，起码是一部有右派思想的。”《五更寒》“有缺点有问题”。《寻爱记》“实在低级”。《牧人之子》中“我们的区干部的形象实在太坏，像国民党的侦探。”

在点名批判一系列影片后，康生一再声称“问题很严重”，并且提到“什么叫社会主义革命”高度，认为“受波匈事件的影响较大，受修正主义思潮冲击得很厉害”“说明存在着两个改造问题，一是以

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一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无产阶级思想”“两种改造在电影方面表现得很清楚，是我们改造他们还是他们改造我们”，要求“文化部电影局找上几个典型摸一下，搞搞试验田。过去我说过，文化部的会不要在北京开，到上影、长影找一些人抓住一些问题研究，展开辩论”。最后他咄咄逼人、危言耸听地加以总结，“总之一阵大风浪来了，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sup>[2]</sup>

## 二、展开：对照检查

周恩来的指示、康生的讲话非同寻常，尤其后者号称政治思想战线“理论权威”，即将出任新成立的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显然极有分量，而且大有来头，与当时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三大改造实际上是两大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改造小资产阶级”等精神一脉相承。

处于沉重压力之下，根据中宣部、文化部党组的指示，文化部电影局迅即以“电影创作思想跃进会议”形式，大张旗鼓进行贯彻，而且按照康生所说“不要在北京开”，于5月9日至19日、13日至6月4日，分别在长春、上海举行。

恰在此时，在为发动全面大跃进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拔白旗、插红旗”问题。在5月8日的讲话中说：“旗子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要插白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sup>[3]</sup>此后又反复提及，“白旗”“红旗”遂成一种时髦而形象的特定制政治概念，“白旗”即指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1] 陈荒煤：《永恒的纪念》，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周总理在制片厂厂长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印：《长春电影制片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材料汇编》，1968年3月，第125、126页。

[2] 《康生同志在制片厂厂长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印：《长春电影制片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材料汇编》，1968年3月，第126-129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6页。

“红旗”则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拔白旗、插红旗”，也就是灭资兴无。

“电影创作会议”得风气之先，即以此为主旨，两处座谈会的进程不完全一样，但贯彻会议的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即通过对去年（指1957年——引者，下同）电影工作的总结，着重就某些影片创作中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进行讨论和批判，大破大立，兴无灭资，为电影事业的大跃进创立条件。《文艺报》《中国电影》为之刊发的专门报道，就以“高举红旗，大破大立”“拔掉资产阶级白旗、高举社会主义帅旗”为题，称“这几个会议是电影创作干部艺术思想上一次大破大立、兴无灭资的思想跃进会议”，并有“拔掉白旗、插上红旗”的表述<sup>[1]</sup>。

长春会议参加者为长影、北影、八一3个北方电影厂的创作人员，到会120余人，“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对创作思想展开自由辩论，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小组会上争论热烈，大会上发言有30余人”“着重检查1957年所摄制的影片在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和反映现代生活题材、风格、样式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良倾向”，长影厂还发动职工以“大字报”形式展开检查批评所出的影片。原本在“双百”方针推动下，积极反映现实，大胆揭露矛盾，改变回避表现知识分子现象，进入爱情道德领域探索等方面所做努力，被认为“在当时国际修正主义思潮侵袭和国内右派分子进攻的影响下，错误很严重。有些作品直接攻击党、否定了党的领导，在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借口下，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做了严重的歪曲，系统地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具体表现为“抹煞党的领导，对党员形象和党内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歪曲了生活的真实”“滥用讽刺，破坏了讽刺喜剧片的真实性”“戏不够，爱来凑”，把爱情故事庸俗化”“生活浪化，到处是花”（指电影美术、音乐创作问题——引者）等，涉及影片有《未完成的喜剧》《球场风波》《谁是被抛弃的人》《寻爱记》《幸福》《花好月圆》《情长谊深》《悬崖》《青春的脚步》《上海姑娘》《球场风波》《芦笙恋歌》《生活的浪花》等。<sup>[2]</sup>

共同主持会议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中共吉林省委文教部长宋振庭都作了发言，称“不从这些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不会有真正的艺术创造，结果会把艺术引导到资产阶级堕落艺术的死路上去”“这

种倾向资产阶级思想与修正主义的倾向，比之过去八年还多”“在于对党的‘百花齐放’的错误理解……放，是为了促使社会主义放，不是容忍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泛滥”“在文艺人特别是电影界，旧东西、老东西、老箱底、沉重的（也是痛苦的）资产阶级遗产又是那么多、可照搬，模仿的样子又是那么吸引人，合乎口味情调的老相识老交情和新相识新同道又那么诱人，时机一到，这些东西的作用就发挥了作用，其结果就是1957年举行了一次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展览。”<sup>[3]</sup>

与会不少创作人员“经过对去年许多影片的总结检查”“看到了自己思想情况的严重性”，纷纷做了“检查发言”，“深深感到不拔掉自己思想上的白旗，插上红旗，要求创作跃进是不可能的。”<sup>[4]</sup>

上海会议由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召集，所属天马、海燕、江南等各厂创作人员参加。会上联系上影的创作进行讨论，“认识到在去年的电影创作中，出现了一股逆流，有些影片，并不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有些影片，格调低劣，趣味庸俗。”除批判了《球场风波》，斥为“是一部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诬蔑新社会的坏影片，它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尽力加以美化颂扬”，重点讨论了《凤凰之歌》，“曾被不少同志称赞为去年拍摄的较优秀影片之一，认为人物性格鲜明，样式新颖等等，却忽略了影片在思想上的严重缺陷——在这里看不到党

[1]《高举红旗 大破大立——长春、上海电影创作思想跃进座谈会追记》，载《文艺报》1958年第17期；《拔掉资产阶级白旗、高举社会主义帅旗——记长春、上海的电影创作思想跃进会》，载《中国电影》1958年第7期。

[2]《高举红旗 大破大立——长春、上海电影创作思想跃进座谈会追记》，载《文艺报》1958年第17期；《大破大立，兴无灭资，电影创作思想大跃进！让我国电影艺术阵地上红旗飘扬》，载《大众电影》1958年第11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页。

[3]《林默涵在电影跃进会上的报告》《陈荒煤发言》《宋振庭在三厂跃进会上的发言》，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印：《长春电影制片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材料汇编》，1968年3月，第132、133、145页。

[4]《高举红旗 大破大立——长春、上海电影创作思想跃进座谈会追记》，载《文艺报》1958年第17期。



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金凤的求得解放，也仅仅依靠了自身的个人奋斗”，认识到“所以开始不能觉察这部影片的问题，正反映了自己对农村生活的无知，阶级情感不鲜明，相反却对五四时代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爱情自由，个性解放，引起了共鸣”。

创作人员“联系影片，联系思想，也都对自己做了深入细致的检查”“觉得在去年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浪潮的影响下，加上不少创作人员尚未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中解放出来，因此创作出一些有错误的、表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影片”“在银幕上就充满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角恋爱、庸俗低级趣味等等题材。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表现得卑躬屈膝，对工农兵以及党员形象，则不感兴趣，甚至肆意歪曲”。《情长谊深》的编导徐昌霖，检查了“拜倒在资产阶级思想面前”“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内容来表现友谊”的严重错误；《球场风波》导演毛羽，检查了“自己在创作上的资产阶级立场”；《乘风破浪》编导孙渝，检查了“对工人阶级思想感情不熟悉”“往往是以旧的一套去代替”的问题。<sup>[1]</sup>

### 三、高潮：内外夹击

就在长春、上海会议行将结束之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相继刊发社论，阐述毛泽东关于“插红旗、拔白旗”的主张，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为大跃进扫清思想上、组织上的障碍，一个声势浩大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展开。

“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影片，遂公开成为需要拔除的电影“白旗”，由界内扩展至社会，形成揭发批判浪潮，从专业电影刊物《中国电影》《大众电影》，到《人民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等新闻媒介，相继刊发各种批判文章、编导检查等，涉及片目除长春、上海“创作思想跃进会议”所及，还扩展至《洞箫横吹》《五更寒》《不夜城》《探亲记》《母女教师》等，“其来势之凶猛、声势之强劲，可与此后‘文革’中的‘大批判’相媲美”。<sup>[2]</sup>

把银幕“拔白旗”推向最高潮的，是1958年12月2日，陈荒煤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1957年电影艺术片中错误思想倾向的批判》的重要文章，因其文化部电影

局副局长的身份与实际主管电影艺术创作生产的职责，加之刊载于最高级别、最具权威、最有影响的中央党报，成为电影战线这场“兴无灭资运动”的代表标志和成果总结。

文中宣称“由于电影艺术创作者绝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原来的立场观点还没有彻底改变”“那个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企图并没有完全摧毁，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这些渣滓又浮了上来”，点名23部属于“白旗”影片，涵盖“已经放映的”“拍摄完毕后还需要做修改或者根本不能放映”，分为三种类型进行批判。

第一，“滥用讽刺，借口‘反映真实’‘干预生活’，直接攻击党和新社会，反对党的领导”，认为“1957年的影片中，讽刺喜剧特别流行”，《未完成的喜剧》“直接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新社会”；《谁是被遗弃的人》“给人的印象只是：老党员、老干部进了城，当了领导，就都变质了”；“同样的观点，也反映在《探亲记》这个剧本里”；《球场风波》“几乎讽刺了所有的人，唯独那一对资产阶级教授父女却被描写成那样热心积极、温文尔雅”；《寻爱记》“似乎是讽刺张士禄和马美娜的资产阶级思想。然而作者对李勇这个所谓正面人物也做了许多讽刺，并且最后还让那两个招摇撞骗的青年男女结合在一起”；《幸福》“是讽刺王家有的，可是，对他的错误思想并没有给予有力的批判”；《三个战友》“对于‘大洋马’也是如此。”

第二，“抹杀党的领导，违反党的政策，取消或歪曲党员及领导人物的形象，歪曲党的生活和作风”，认为“1957年的艺术片中，有好些影片有意回避描写或取消党员和党的领导的形象”，《青春的脚步》“导演把原作中党员的称号都取消了”；《情长谊深》“原来剧本中有一个党员副所长”“戏全部删掉了”；《生活的浪花》和《悬崖》“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斗争，也都看不到党的领导”；《雾海夜航》“只看到一个代理支部书记满头大汗，惊慌失措地恳求船长停车但是仍然服从了船长错误的指示。等到触礁事故发生之后，

[1] 《在电影创作中高举政治帅旗，坚持工农兵文艺方向！上影举行创作思想跃进大会》，载《大众电影》1958年第12期。

[2] 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1965），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页。

这位代理支书就从此‘失踪’了”；《幸福》《护士日记》《牧人之子》《洞箫横吹》《母女教师》《乘风破浪》《凤凰之歌》等，“只着重表现了他们个人的斗争，对党的组织和领导所给予他们的支持和力量，却表现得非常微弱，甚至把一些不正确的作风和错误的领导方法，也当作好的东西来表现”“体现在银幕上的党员和领导人员的形象，就苍白无力，缺乏生气，甚至简单粗暴，作风生硬，不近情理。”

第三，“宣扬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思想情感，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认为“去年摄制的一些有关知识分子题材的影片，如《情长谊深》《青春的脚步》《悬崖》《乘风破浪》《护士日记》《复试》《生活的浪花》《上海姑娘》等，几乎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就是千方百计、借尸还魂地来表现、宣扬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甚至为了美化、突出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不惜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歪曲工人群众和党的领导形象”“不仅没有能够表现党和群众的力量与作用，却在歌颂各种各样的个人奋斗，把前进的动力归结为爱情和友谊，甚至是个人主义者的痛苦、矛盾和错误”“严重的是，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不但在这些描写知识分子的影片中泛滥着，甚至在表现少数民族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影片中也泛滥着。《芦笙恋歌》原来的主题是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但现在却成了‘恋爱至上’的《人猿泰山》式的影片”“《花好月圆》除了突出、夸大了三对青年的恋爱外，把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条主线抽掉了”“《不夜城》这样一部资产阶级的赞歌的影片，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宣扬真是淋漓尽致！”

文章确定所批判的这些影片的错误“是带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实质上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方向的动摇和叛变，一直到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在电影阵地上的反映，这是一场尖锐的阵地争夺战，是电影艺术方面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对于这些影片产生的原因，文章归结为电影局领导“没有常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和帮助创作人员深入生活、锻炼改造”；电影局和制片厂领导“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与生活情调，以及艺术观点、艺术趣味，至今还束缚着、支配着我们某些艺术家”。并对其在负责艺术片生产的领导工作

和贯彻“双百方针”中的“右倾思想”作了检讨。

#### 四、收场：互文纠偏

岂料仅隔3个月，事情就发生变化。《人民日报》于1959年3月4日，以“对1957年一些影片的评价问题”为题，刊载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市电影局局长袁文殊与陈荒煤的通信，对陈荒煤的原先文章进行批评与修正。《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称，“我们认为，袁文殊同志提出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对这篇文章的处理也是有缺点的。”

袁文殊认为陈文“对1957年我国电影艺术创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作了肯定之后，思想进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其中许多意见也极可宝贵”，同时“也还感到有些不足和看法上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在信中提出来进行商讨：

首先，认为陈文“从影片样式上来区分问题，把喜剧影片归到一类来进行批判，就势必把许多错误性质不同，或只有一些缺点的喜剧影片都混淆在一起了，这是不恰当的”，所批评的《谁是被抛弃的人》《寻爱记》《球场风波》《三个战友》《幸福》等等许多影片，“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缺点错误，个别片子错误还很严重，但不应把它们一律和《未完成的喜剧》相提并论”，“这样的影片的确反映了我们创作人员的思想感情的庸俗和情操的低下，对观众不会产生提高道德品质的教育作用。但这些都只是思想上艺术上的缺点或错误，同恶意攻击我们的党和社会的《未完成的喜剧》是有根本性质的区别的。因此，把这类影片和《未完成的喜剧》划在一道，都归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就感到话有点说过了头了。其结果就势必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错误混淆起来，把错误严重化”，“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方法是不恰当的”。

其次，认为陈文“把所有在表现党的领导上存在着缺点的影片，不论其情况如何，都一概划为‘抹煞党的领导，违反党的政策，取消或歪曲党员及领导人的形象，歪曲党的生活和作风’，这也把问题扩大化了”“那些影片的主要倾向还是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有很大的片面性”。《护士日记》“基调是向上的，基本上是健康的”“影片的客观效果，基本上是好的，是有一定的鼓舞人的力量的”，《母女教师》《乘风破浪》《牧人之子》和《幸福》等，“虽然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缺点，但是它的主要方向

还是正确的”。“既然大多数影片是属于思想问题，就只能得出思想错误的结论，而不应该得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性的结论”。

再次是，认为“关于在影片中表现党的领导的问题”，陈文“也说得不够清楚，因此有使人产生误解的地方”“对那些不愿意在影片中表现党团员形象的创作者，可以指出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的错误想法，对那些表现了党团员形象而表现得不够恰当、不好的创作者，应该分析他们为什么表现不恰当的原因，实事求是地把他们的缺点指出来，使他们引为教训，更多地从正面来谈会更贴切一些”。

最后，提出“把‘白旗’这个名词用来批判艺术思想，现在看来并不妥当”。

陈荒煤的复信，表示“基本上同意”袁文殊“所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承认“文章最主要的缺点，是在批判错误倾向的同时，对各种影片中所表现的程度不同的错误，特别是错误的性质，没有仔细地加以区别，具体的分析很不够”。解释是因为“1957年是我们近几年艺术生产量最多的一年，然而艺术创作中思想上的混乱却也是惊人的”“个人感触很深，痛感到责任的重大，因此，写文章就强调了错误的倾向这一方面，而忽视了指出错误倾向的同时，仔细区别影片中错误的不同的性质和程度上的区别，只就作品中所流露的某一种错误倾向而归于一类，既没有首先从政治上来区别错误的性质，也没有能细致地判断错误的程度”。

陈荒煤重申“有一点意见我还保留自己的看法”，就是“1957年影片的错误的倾向”“尽管表现形态各不相同，实质上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方向的动摇和叛变，一直到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这个看法还是可以的，是不过分的。”同时，表示“问题是从对工农兵方向动摇到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这中间还有很大距离，我说得太笼统，缺乏对各种不同情况的具体分析。同时如果我不‘叛变’‘白旗’这些字眼，而只说这是对工农兵方向的动摇和违背，个别影片竟达到了反党的地步，这样也许更恰当，更符合事实一些”。

对于“把许多有错误思想的影片一律叫作‘白旗’，是不恰当的”，陈荒煤表示同意，说明在写那篇文章时，“对‘白旗’这个概念是不明确的，当时，是一般地指资产阶级的思想。现在看来，用‘白旗’这个名词来批判创作中的资产阶

级的思想是很不恰当的。红旗和白旗应该是指政治上的两条道路、大是大非、香花与毒草的区别，而文学艺术创作现象是复杂的，恐怕很难以此作简单的判断”。

来势迅猛的银幕“拔白旗”，就这样以颇具戏剧性的“双簧”式互文收场。一种说法是袁文殊之所以写信“叫板”陈荒煤文章，乃“上海王”柯庆施指令，其所以反对，“既不是因为文章犯了左的错误，也不是因为文章中点到的影片涉及上海”，而是“早已对夏（衍）、陈（荒煤）耿耿于怀，凡是他们说的他都要设法反对”。更为主要的，还是中央对“拔白旗”等“左倾”偏差开始纠正，1958年12月28日，周恩来召集陆定一、康生、周扬、胡乔木、夏衍、林默涵等22人，就文艺、卫生、体育等方面在高速发展中的某些偏差进行商议。周恩来提出“精神产品不能放‘卫星’”；教育方面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不赞成要求文艺简单配合政策的做法；要注意研究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据称袁文殊的文章经过了胡乔木和周扬的审定。<sup>[1]</sup>

囿于当时总体政治气候和思想认识水平，袁、陈二人的“纠偏”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直到“文革”之后才对电影“拔白旗”运动的错误实质进行更深层的触及与反思，陈荒煤亦曾对自己当初文章表示内疚和自责，向一些受到伤害的艺术家道歉。更令其终生难忘并引以为训的是，“拔白旗”运动批判、否定了一大批优秀作品，造成在全国各地遭到禁映，而且一批已经完成剧本或拍摄的富有新意的现实题材影片，被迫下马或修改，严重打击了广大电影工作者创新探索的积极性，致使影片质量出现大幅下滑，再次印证：艺术创作上的不足与缺失，最终只能依靠文艺批评和学术论争等方式来解决，运用政治运动甚至阶级斗争等大而无当的方式，不仅于解决问题无益，反而会引起电影工作者的思想混乱，使电影艺术发展陷入更为深重困境。

〔朱安平 中国妇女报社高级记者〕

〔1〕严平：《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编：《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9页。